



汉文佛典词汇研究现状述要

张延成 童 健

摘 要: 通过建立数据库和计量统计,从综论模式、词汇学模式、训诂与文献整理模式三方面综述近年来佛典词汇研究的成果,发现目前佛典词汇和语言研究应重视对佛典语料性质所决定的特殊语言现象和规律的探索并注重语言学理论的指导,注意理论总结,佛典训诂研究尚需加强。

关键词: 佛经;佛典;词汇学;训诂

利用汉文佛典文献^①进行汉语史研究已有百年历史,佛典语言研究极大地推进了汉语历史语言学研究的进程,并对历史、文化、考古、文学、哲学等相关学科研究产生广泛影响^②。进入 21 世纪以后,由于佛典语言研究的兴盛,相关综述论文几乎年均一篇地出现。由于新成果的研究视角、方法以及内容的多样化,不同类型和学术旨趣的文献综论工作仍需加强。本文试图通过定量统计,从理论语言学以及宗教和语言学交叉研究的视角对近年来^③佛典词汇研究作一概述。为此,我们建了一个总量达 2147 条的佛典语言研究文献数据库,并根据语言学特征设定标签(如“语法”、“词汇”、“梵汉”等),对数据库进行不同类别和级别的人工标注。据统计,词汇类文献 730 篇、语法类 464 篇、音韵类 169 篇、校勘类 77 篇、汉外对比类 127 篇、音义类 117 篇等。从年代角度看,20 世纪 80 年代是一个分水岭,此期共 263 篇文献,比 70 年代增长约 15 倍,到 90 年代和 21 世纪基本以每 10 年 2 倍以上的速率增长。数据显示,词汇研究仍然是热点。限于篇幅,本文只综述词汇方面(虚词、构词法归在语法部分)的文献。

汉文佛典文献词汇研究可以大致分为综论模式、词汇学模式、训诂与文献整理模式。综论模式包括综述和评论成果;词汇学模式偏重于不同类型的词汇系语义系统以及词汇个案描写与演变研究;训诂与文献整理模式包括难词考释、语料考辨、句读校勘、校注译注等。

一、综论模式

对佛典词汇研究的综述文献数量可观,其中不少论文对佛典词汇研究成果的内容与得失、研究理论与方法有精当的评论,有必要为之专门立目总结。

曾昭聪等《佛典文献词汇研究的现状与展望》(2010)将佛典语料分汉译佛经、中土佛经(尤其是唐宋禅宗语录)、史传著作、地志著作、佛经音义、佛教目录著作 6 类,从词语考释、疑伪经语料性质及译者考辨、同经异译、版本异文、梵汉对勘词汇现象、佛典与中土文

① 指汉译佛经、中土佛经以及佛教史传、地志、音义、目录等著作。参见曾昭聪、刘玉红:《佛典文献词汇研究的现状与展望》,载《暨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 年第 2 期,第 47 页。

② 参见吴光正等:《异质文化的碰撞》,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9 年,序言第 1~3 页。

③ 本文侧重于近两年的研究成果,对于已有综述中没有或较少提及的文章也较多措意。对已被综述的文章,若有新分类、新评述、新引证的必要,也不避重复。

献词汇对比、佛经修辞、词汇理论等8个方面总结研究的进展,认为:佛典词汇研究今后应注意多层次的比较,在梵汉对勘基础上扩展到利用其他印度古语言和中亚地区的语言;研究方法上应注意利用训诂学、语义学理论的指导;强调汉译佛经词汇研究必须与中土文献相结合进行。方一新、郭晓妮《近十年中古汉语词汇研究的回顾与展望》(2010)对涉及佛典语言研究的评述切中肯綮,提出加强词汇强系统性和内部规律研究、借鉴新理论和方法、加强专书专题研究、加强语料挖掘和语料库建设和科研规划、开阔视野等意见^①。

董志翘《汉语史分期与20世纪前的中古汉语词汇研究》(2011)举例申论佛典音义对中古俗语词研究的重要价值。王冰《三十年来国内汉译佛经词汇研究述评》(2011)认为三十年来汉译佛经词汇的研究不断深入,取得不少成绩。研究方法上,佛经语料与中土文献比较、梵汉结合、方言佐证等都有成功运用。存在的问题是:语料选择上偏重晋以前的佛经,对南北朝以后的佛经措意不足;研究中零星、具体考释较多,系统的研究较少;汉译佛典与原典的比较研究不够深入^②。彭杨莉《佛教汉语词汇研究述评》(2011)认为佛经词汇研究在语料选择上对佛教史地著述、人物传记、论著、目录等重视不够,研究方法上较少探讨佛教汉语词汇的产生和发展规律,倡导对专门佛典的词汇研究、译者语言专门研究、加强词汇理论研究等^③。

二、词汇学模式

(一) 特定词汇、语义类型的研究

外来词。新世纪的头10年有一批佛源外来词的研究成果值得关注,如孙维张主编的《佛源语词词典》(2007)等。于朝兰《从外来词的角度看三国时期佛经汉译的特点》(2009)认为三国时期佛经翻译有意译化倾向,外来词词形处于“汰选”的“过渡性并存”阶段。俞理明、顾满林《东汉佛教文献词汇新质中的外来成分》(2011)通过词汇计量等方法论证东汉佛经用语新异感的6点成因:音译词长度;音译形式组合;部分音译词的高频使用;音译词的表意与汉语不同(如“般遮旬”义为五神通);音译词新义;使用经典罕用的流俗词语(如“大家”指主人等。文中“卤簿”例^④不佳,该词应为中土正史一般书面语)。张诒三《试论佛源外来词的定型化》(2011)总结出译借方式定型、音译词的定型、意译词的定型、音节定型、用字定型(如“阎魔”、“炎摩”、“焰摩”、“琰摩”、“爇魔”等定型为“阎王”、“阎魔王”)等类型。梁芳《〈大般涅槃经〉双音外来词研究》(2011)从表意方式、结构形式、成词规律、衍生与沿用轨迹等方面展开论述,有新见。

常用词与词义演变。聂志军《西晋以前汉译佛经中“说类词”连用情况研究》(2007)发现复音节“说类词”大量出现,有些可以从语法上分析、有些与译者的喜好有关、有些纯粹属于语言发展过渡阶段的混用状态。杨继光《中古佛经常用词组合关系考察》(2008)以“诽谤”(对象不限于人,可以是佛经、朝廷等)、“翔”(相当于到、抵达)、“建”(可与“心”、“意”、“志”等组合)等为例说明常用词的组合关系在汉语史上经历了很大的变化。鲍金华《论中古时期汉文佛典和中土文献常用词语的差异》(2010)发现中土文献中活跃的“瘞”和程度副词“雅”在佛经中却难得一见。

同义词、反义词。吴碧云《〈生经〉同义词研究》(硕^⑤,2009)总结150组同义词,发现不少同义实词和虚词是为避免行文重复而造成的,不是为了表达语义的微妙差别。康振栋《竺法护翻译佛经词汇研究》(博,2011)探讨了竺法护译经同义词判断标准及其历时演变情况。

语义场。谭代龙《义净译经身体运动概念场词汇系统及其演变研究》(2008)考察了非位移运动和位移运动概念场词汇系统及其演变,认为应该加强对“共时材料”中存在的新旧系统成员共存局面的研究,提出概念场结构顺序原则(复合动词词序受时间像似性制约)。姜兴鲁《竺法护译经感觉动词语义场研

①方一新、郭晓妮:《近十年中古汉语词汇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载《古汉语研究》2010年第3期。

②王冰:《三十年来国内汉译佛经词汇研究述评》,载《华夏文化论坛》2011年第6辑。

③彭杨莉:《佛教汉语词汇研究述评》,载《华中人文论丛》2011年第2期。

④俞理明、顾满林:《东汉佛教文献词汇新质中的外来成分》,载《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第47页。

⑤博、硕论文分别标以(博)、(硕)。

究》(博, 2011)将竺法护译经中的感觉动词语义场分为视觉、听觉、味觉、嗅觉和触觉五个动词子语义场,考察其演变特点(如内部不平衡性、发展演变的动态一致性等),分析其演变的内因(如语义系统影响、歧义避免机制、词义虚化)和外因(认知和社会因素)。

专名研究。顾满林《汉文佛典中 Kapila-vastu 一词的音译形式考察》(2007)分析 64 种不同的释迦牟尼降生地的译名,发现翻译佛典创造的音译形式可以进入中土撰述,中土撰述新创的音译形式则从未进入翻译佛典,概括出“沿用”和“求准”是音译形式产生和使用的两大原则。陈源源《同经异译佛经人名管窥——以〈法华经〉异译三经为例》(2008)发现《法华经》和《添品法华经》所译佛经人名完全相同,而《正法华经》的翻译则有较大不同。庆昭蓉《库车出土文书所见粟特佛教徒》(2012)认为汉文文书中安拂勒、安伏梢、罗胡数芬等人名与粟特语有关,苏射提、俱满提、俱潘地黎可能来自龟兹语。

成语、俗词等。阮文程《成语佛源》(硕, 2006)从构词语素和语义类型角度对佛源成语进行分类,论述其融入途径和意义引申等。高列过(2009)发表两篇关涉中古汉译佛经比喻的成语溯源文章,如“干柴烈火”、“空中楼阁”等,指出有关辞书书证有误。雷汉卿《禅籍方俗词研究》(2010)提出审辨字形、方言佐证、禅籍文本互参三种研究方法,论述禅籍方俗词在文献整理、汉语词汇史、现代常用词研究方面的价值,从语法构词、修辞转化、缩略、用典角度探讨禅籍词衍生途径,从引申、感染、虚化、隐喻等方面论述方俗词义演变的途径。薛春华《禅宗语录熟语研究》(硕, 2011)阐发了相关理论,考察了禅录熟语的来源、行业色彩、发展演变及其对后世汉语的影响。

称谓词。徐琳等《〈祖堂集〉佛教称谓词语研究》(2010)描述《祖堂集》中对僧人的直接称谓词、富于感情色彩的称谓词以及与佛教有关的其他称谓词,分析这些词语的来源与结构,总结其本土化、专门化、繁杂化、口语化、双音节占主体等特点。许卫东《〈高僧传〉中僧人佛徒称谓探讨》(2011)总结四种僧人佛徒称谓来源类型:音译型,如比丘等;借用型,如徒众等;混合型,如禅师等;意译型,如贫道等。认为《高僧传》作为较早的与佛教有关的中土文献,在译经语言与汉语趋于融合过程中起中介作用。

(二) 专人专书研究

专人、专书或专门佛经的词汇研究以多中古语料为现象。据柳榕(2008)统计,唐以后中土佛典史传部共 27 部,但除了《大唐西域记》、《法苑珠林》、《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等,其他史传部佛典研究很不足。

专人词汇系统研究。上文提到的曹荣芳(2006)、姜兴鲁(2011)对竺法护译经的专项研究即其例。赖明辉《鸠摩罗什译经中的趋向动词研究》(硕, 2011)认为东晋姚秦时期,单音节趋向动词多数已经形成,复合趋向动词也正在形成之中;各个趋向动词的发展情况并不平衡,以“来”“去”的发展最为充分。康振栋《竺法护翻译佛经词汇研究》(博, 2011)以《正法华经》词汇为中心,考释了竺法护译经中 300 余条疑难词语;对美国学者丹尼尔·布歇(Daniel Boucher)提出的“早期汉译佛经的大部分是由犍陀罗母本翻译而来”的看法提出了批评;论证了“词义灌注”现象的双重理据性;运用认知理论,论证了汉译佛经外来词资格的不平等性,阐明把汉译佛经意译词归为外来词的现实和理论依据。

专经或专书词汇综合研究。邱冰《〈佛所行赞〉词汇研究》(博, 2008)列出梵汉逐字句对勘材料,考察了《佛所行赞》中有别于中土文献的特殊词汇现象并采用语言接触理论和翻译理论进行解释,进而讨论佛经翻译对汉语词汇发展的影响。李明龙《〈续高僧传〉词汇研究》(2011)论述了该专书中佛教词、文言词、俗语词的混合杂糅特征及其过渡性。

相关比较研究。1994 年以来已有多篇文献采用比较研究方式,类型有同经异译比较、不同译者译经比较、中土与佛典文献比较、道典与佛典文献比较、跨代佛典文献比较等。对比研究有助于发现和解决词语训诂问题,有助于观察词汇的风格变异与历时嬗变、有助于彰显佛典文献的词汇史研究价值(不少研究证明佛典文献的双音化程度较高)。邹伟林《〈普曜经〉与其异译本〈方广大庄严经〉语词比较》(2011)比较了“寐”、“捐”、“立”等三组词语的用词和演变情况,认为地婆诃罗在重译时较为追求语言的雅致流畅,竺法护则行文质直而稍嫌晦涩。程晓朝《〈修行本起经〉与其异译本〈过去现在因果经〉词语比较举隅》(2012)以“归命”、“群生”等 5 组词为例说明词汇演变过程中的替换、双音化等现象以及译者译风对词汇的影响。

(三) 断代词汇综合性考察

颜洽茂《试论中古译经文体及其对语词的影响》(2007)是对中古词汇系统变化动因的新考察,其社科基金项目《中古汉语词汇研究——汉译佛典词汇研究》(2009)力图将个别词语考释、断代词汇面貌清理与汉语历史词汇的系统、理论研究有机结合起来进行综合探讨,认为(1)翻译文体组织结构具有负面效应,它造成佛经语词的增扩、添加和节缩,干扰了语词识别;(2)中古汉译佛典中佛教用语与世俗用语呈现互相渗透的态势;(3)中古汉译佛典词汇推动了汉语造词法向更高级阶段的演进,表明汉语造词已实现语音造词为中心向结构造词为中心的转移;等。

(四) 佛典语言词典与编纂

林光明(2009)将日本中村元编著的《广说佛教语大辞典》(2001)翻译成中文出版,该词典融合了二十世纪梵、巴、藏文的佛学研究成果。辛岛静志《正法华经词典》(1998)、《妙法莲华经词典》(2001)、《道行般若经词典》(2010)等既是专经词典编纂的典范,又是佛典词汇研究的重要成果。作者重视收录口语词以及佛教词、音写词、咒文陀罗尼,对音写词标上高本汉、李方桂等《切韵》拟音,注意对照《汉语大词典》、《大汉和辞典》以及学界研究成果。徐文堪《略论印汉翻译史研究和佛教汉语词典编纂》(2009)提出基于汉译佛典的语汇、语法、文体考察,参证、对比梵语和各种中亚语言佛典的佛教汉语词典编撰建议。

(五) 新词新义与辞书补正

用《汉语大词典》、佛学词典和有关训诂词汇专书作为参照,研究佛经新词新义和补正辞书的工作一直是研究的热点。曹小云《早期汉译佛经与中古汉语词语溯源》(2010)探求某些中古词语的较早用例,如弊恶、乏短、僻静、开拓等。张鑫媛《〈汉语大词典〉拾遗——以〈撰集百缘经〉为例》(2010)举例说明《大词典》存在词条失收(如“渴仰”等)、义项阙失(如“善听”之“善”有仔细、注意之义)、书证晚出(如“敬仰”)等问题。呼叙利《佛经词语札记》(2010)分析语素“分”与方位语素组成的合成词(如“上分”、“前分”),描写其指物体、人体、时间、经书、文章的某一部分,表示某种程度和等级等复杂用法。于淑健《敦煌佛典语词和俗字研究——以敦煌古佚疑伪经为中心》(2012)研究提出《汉语大词典》可增补的词条118个(如“背丧”、“珍妙”、“在在处处”等),可添加义项的22个(如“按摩”是武术的一种),释义不周和错误的18个(如“胜利”、“倡荡”等),提供更早书证的28个(如“一往”、“悦可”等)。

(六) 理论与方法总结

竺家宁等学者都倡导运用现代词汇语义学的新方法和理论,例如义素分析法、语义场等理论研究佛典词汇。颜洽茂提出佛经语词的“灌注得义”、“逸义”(即“义项漏略”)等概念。王云路等对汉译佛经中新词新义的产生途径和理据多有总结。方一新对中古汉语词汇研究理论意识偏弱有深刻反思,他指出“在词汇史的研究中应进一步注重理论的探索和方法的更新,要根据汉语的实际情况,合理吸收、借鉴当代语言学理论,既要善于运用业经证明行之有效的理论来指导研究工作,更要善于对已发掘到的重要的语言事实或已得出的有价值的结论进行理论的概括。”^①

三、训诂与文献整理模式

本文将训诂模式与词汇学模式分开综述,系着眼于二者研究目的、方法的差异以及词语考释的难度。通过综述,我们发现近年来佛典语言训诂研究不够景气,其原因或为黄征所指出的:“许多学者不再追求训诂学的研究的‘高精尖’,转而描述汉语史词汇的一般情况”^②。

训诂成果举例。曾良《佛经字词考释五则》(2011)藉佛经字词校勘经验施之于同期和后期的中土文献,颇有发现,如以佛经中“拖暉”“挖暉”为“施暉”之讹证《古本小说集成》清刊本《鸳鸯配》中“片云拖雨过江城”中“拖”当为“施”。史光辉《“乙密”补释》(2011)举出《正法华经》和《旧杂譬喻经》中例子论证《太平经》中“乙密”一词是“细密、仔细”的意思,释为“隐密”是不妥的。郑贤章、姚瑶《汉文佛典与〈集韵〉疑

① 方一新、郭晓妮:《近十年中古汉语词汇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载《古汉语研究》2010年第3期,第33页。

② 于淑健:《敦煌佛典语词和俗字研究——以敦煌古佚和疑伪经为中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黄征《序》第1~2页。

难字研究》(2011)以汉文佛典例证《集韵》疑难字词、纠补《集韵》若干阙失。孙秀青《〈玄应音义〉疑难词释疑》(2012)借助文献和方言材料说明“匡”及相关异体形式有弯曲义、“葍”(及其俗体形式)表两腿交错等。李维琦《佛经释词三续》(2012)通过异译经的比较考证《般若》经中的“自然”基本意义是性质、自性,自性即无性,所以引申出无自性、无性、无的意思,而经中多用其引申义;“恍惚”为虚幻不实之义;等。

文献整理研究。从语言研究角度看,对汉译佛典进行句读、校勘、注释、翻译和语料考辨等需要借鉴并运用词汇、训诂研究的成果与方法,同时也积极影响词汇、训诂的研究。校勘精良的文本也是词汇训诂研究的基础。黄宝生(2011)译注的《梵汉对勘维摩诘所说经》、《梵汉对勘入菩提行论》、《梵汉对勘入楞伽经》包括梵文佛经原文、现代汉语今译、古代汉译和对勘注释,解决不少词汇校勘问题。吴超《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所见〈慈悲道场忏法〉考释》(2011)对元版本文本做了校勘和考释。方一新、高列过《海外学者对东汉可疑佛经的考辨》(2011)综述5位日本学者和欧美学者许理和对东汉译经的语料考辨工作并提供许氏考订的篇目。辛岛静志《道行般若经校注》(2011)参照了十多种版本和出土材料。王毅力一组考辨文章引人注目,如《从词汇角度看〈大比丘三千威仪〉的翻译年代》(2011),《从词语角度看〈菩萨本缘经〉之译者译年》(2011),《从词汇角度看〈分别功德论〉的翻译年代》(2012)等。

赵家栋《敦煌碑铭赞语词释证》(2012)考证敦煌碑铭赞中“文棍”为“文槐”(指有雕饰花纹的连檐木,借指宫殿)之讹、“纣儒”为“纣(缁)儒”之讹(与“释儒”同义)等。方一新、高列过(2012)《从佛教词语考辨〈大方便佛报恩经〉的时代》用“观世音菩萨”、“一箭道”等12条佛教词语考证该《报恩经》非东汉文献;如果是译经,其翻译年代当在东晋之后。又,《从语言角度鉴别早期可疑佛经的方法和步骤》(2012)从比照对象的确立、语言标准的提取两方面结合实例讨论并进行理论总结。他们的专著《东汉疑伪佛经的语言学考辨研究》(2012)标志着疑伪经考辨工作在理论方法上自觉与渐趋成熟。季琴(2012)《〈大正藏〉中〈大明度经〉》校勘札记》将同经异译的《大明度经》与《道行般若经》进行对比,校出《大正藏》中《大明度经》的不少错误。

四、结 语

综上,近年来佛典词汇研究成绩是显著的,也存在一些隐忧。就综论模式而言,一些正确的呼吁在学界并没有得到及时响应;有些综论不遵循语言学理论标准,理不清词汇语义研究与语法中的构词法、训诂学的词汇考释的界限,不利于推动佛典语言的科学研究。词汇学模式方面,有些文章以“复音词”甚至“构词”之名讨论词汇语义的个案,这样做既不能触及语法语义的核心问题,又回避词汇的系统性探究,很难提振佛典语言研究的档次;有些词汇语义类型研究仍须加强,如专名、委婉语、文学语汇等;译经词汇个人风格特点与佛教文化、断代词汇系统、历时词汇演变的互动研究不够;新词新义研究方面,对大型辞书增补词条和义项的建议比较草率,缺乏词典学的系统考虑。训诂研究比较薄弱,须加强疑难词语的考释。

应该充分认识从佛典语料切入的语言学研究的局限性。佛典材料的领域性和不完备性与语言理论、语言史研究所需断代语料的系统性是矛盾的,这也是一些学者提出的“佛经语言学”概念所面临的难题,夸大佛典语料的作用可能制约对词汇语义的系统及词汇发展内部机制的考察。佛典词汇研究,无论是具体个案的还是宏观的,应加强对这种语料性质所关联的特定语言现象和规律探索,如特定文体佛典的语言特征、佛经中介语性质、语言接触、语言和宗教文化互动研究等。

●作者简介:张延成,武汉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湖北 武汉 430072。

童 健,江汉大学文理学院讲师。

●基金项目:武汉大学“70后”学者学术发展计划;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基金

●责任编辑:何坤翁